

战争记忆的建构与伦理反思：《华沙的木偶男孩》中的气味书写

The Construction of War Memory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dor Writing in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刘胡敏 (Liu Humin) 李璇 (Li Xuan)

内容摘要：伊娃·韦弗的小说《华沙的木偶男孩》充满了各种各样关于气味的书写，更为真实地展现了大屠杀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对气味的感知变为关于战争的记忆符号，存储在脑中构成脑文本，形成战争的个人记忆。气味作为媒介，将个人记忆整合并建构为犹太和德国民族的集体记忆，揭露战争给受害者和施暴者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同时，气味具有丰富的伦理隐喻，揭示战争双方在战争中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气味还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诲作用，促使战后人类对战争正义性的反思，凸显了小说的反战价值。在和平年代，对战争记忆和伦理的研究有助于唤起现代人对战争机制的审视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

关键词：《华沙的木偶男孩》；气味书写；脑文本；战争记忆；伦理反思

作者简介：刘胡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小说、希腊罗马神话；李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叙事和伦理反思研究”【项目批号：19BWW07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War Memory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dor Writing in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Abstract: Various kinds of odor writing abound in Eva Weaver's novel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giving a more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the odo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form the memory symbols and compose brain text,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memories of war. Serving as a medium, odors integrate and construct individual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Jews and the Germans, revealing the indelible war-inflicted trauma of both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At the same time, odors are rich in ethical metaphors, indicating the ethical dilemma both parties face in the war. Odor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e post-war generations by promoting the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justice of war, which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anti-war value of the novel. In the age of peace, studies on the memory and ethics of war are of great help in encouraging modern people to probe into the mechanism of war and contempl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mankind.

Keywords: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odor writing; brain text; war memory; ethical reflection

Authors: **Liu Humin** is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and Greco-Roman mythology (Email: liuhumin88@163.com). **Li Xuan** is Ph.D. candidate a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Email: lixuan118108@163.com).

人类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气味。在韦氏词典中，气味（odor）一词既可指刺激嗅觉器官的物质，又可指由嗅觉器官受到足够的刺激而产生的感知。嗅觉研究专家特里格·恩根（Trygg Engen）在其著作《气味的感知》（*The Perception of Odors*, 1982）中指出“当气味分子到达嗅觉时产生的鼻道或鼻孔顶部的上皮时，便会感知到气味”（17）。在人类发展史上，嗅觉和气味经历了从被贬低到被重视的过程。柏拉图时期，身体及其发出的“气味被认为是灵魂的坟墓”（转引自 瓦润等 12），“嗅觉行为常与动物性对等”（瓦润等 17）。18世纪末到19世纪，为了应对由臭气引发的瘟疫，人们开始重视对气味的研究。20世纪以来，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身体的审美性功能增强，与气味相关的商品琳琅满目，气味研究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根据韦氏词典，记忆（memory）是指通过联想机制再现或回忆已经学习和保留的东西的能力或过程。记忆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早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20世纪以来，记忆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领域的转向。其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社会记忆、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场、简·阿斯曼（Jan Assma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的文化记忆以及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创伤记忆都是战争记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反思战争创伤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具有深远的意义。

伊娃·韦弗（Eva Weaver）是德裔英国当代小说家，其作品涉及归属感、创伤、性欲等主题。《华沙的木偶男孩》（*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2013）是韦弗的第一部小说。大多数大屠杀小说侧重于关注犹太人的创伤，而韦弗的小说主要揭露纳粹暴政下犹太人和德国士兵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和

身心遭受的创伤，对受害者和施暴者都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更加全面和深入。小说《华沙的木偶男孩》中有诸多关于战争气味的描写。本文将气味与记忆相结合，借鉴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聂珍钊的脑文本概念，探讨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将对气味的感知转变为记忆的脑文本，进而探究气味如何建构战争记忆并发挥伦理教诲的作用。气味与记忆的脑文本紧密相连，深化了战争的个人记忆并将个人记忆的脑文本整合和建构为家庭与民族的集体记忆脑文本。同时，气味揭示出被卷入战争的平民和普通士兵的伦理困境，促发人类对战争进行伦理反思。

一、气味与个人的战争记忆：联结与深化

诸多研究表明嗅觉/气味能引发人的情感并与记忆有紧密的联结。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 2010）第一卷中描述了气味与记忆的关系。主人公马塞尔把蛋糕浸泡在红茶里，糕点散发出独特的香气。一战结束后，虽已物是人非，但蛋糕的气味仍然记忆犹新，还让他记起了儿时的家和小镇的样子。普鲁斯特认为：“只有气味和滋味长存，它们在回忆、等待、期望，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不屈不挠地负载着记忆的宏伟大厦”（48）。气味与记忆的这种紧密关系被称为普鲁斯特效应。普鲁斯特效应被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奥格·西米尔（Georg Simmel）发现嗅觉总与人的主观性相关联。¹康斯坦斯·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证实了气味和情感的关系：气味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气味的感知不仅包括气味本身，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经验和情感。²气味成为引发主观情感的媒介，而与情感相联的气味也被研究证明能够唤起记忆。特里格·恩根的研究表明嗅觉和记忆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的嗅觉感知能力是一种加工处理工具，感知传播关于环境的信息并将其编码成记忆。³法国气味学家阿尼克·勒盖莱（Annick Le Guérér）发现嗅觉使过去的事物清晰重现，再现记忆。⁴

小说中的气味也被赋予个人的主观情感，与记忆联系紧密。人的五官感知通过存储在大脑里的脑概念变为更高级阶段的认知，脑概念的组合构成人的思维，形成脑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2-33）。“脑文本借助人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将人的意识转换成记忆符号，存储在大脑中”（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4）。小说中的人物将战场上对气味的感知转变为战争的记忆符号，存储在大脑中形成脑文本。在作者笔下，战争中的各种气味在人物的脑海中变成了

1 参见 齐奥格·西米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瞿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 参见 Constance Classen et al.,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

3 参见 Trygg Engen, *The Perception of Odo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82, 99.

4 参见 阿尼克·勒盖莱：《气味》，黄忠荣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脑文本，这种脑文本通过作者的文字描写变成了小说文本。无论是与战争特征相符的臭气还是战争中难得出现的香气都丰富了人物对战争的感知，深化了战争的个人记忆。

小说中的臭气主要指战场上的硝烟味和血腥气味、犹太隔离区、集中营和德军军营中混杂汗味和其他污浊空气的恶臭气味以及医院里伤口化脓和尸体的腐烂气味。臭气加剧了人物对战争的憎恶，使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战争将人类生存逼到极端状态时的恐怖。犹太男孩米卡和纳粹士兵麦克斯在战时感受到的臭气都在战后重现，意味着不管对德国人还是犹太人而言，战争造成的创伤都难以愈合。具体来看，米卡在被迫为德军表演木偶戏后，身上沾染了德军军营里令人作呕的“香烟、汗水、啤酒”的气味，构成了属于他个人独特的战争记忆。米卡每次表演木偶剧的时候，作者都会描写德军身上散发的这几种混合的臭味，恶臭让米卡感到窒息，也加剧了他对自己行为的愧疚和对德军的厌恶。后来，德军将犹太人驱逐，实行大灭绝措施。在恐怖气息的笼罩之下，米卡曾经温暖的公寓充满了“阴暗和烦闷的空气”（105）¹，他急于逃离公寓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去孤儿院看望孩子。战争的恶臭味也延续到了战后。初来纽约的时候，米卡像行尸走肉一样在纽约的大街上游荡，没人愿意倾听他在华沙的战斗故事：“纽约满是噪音和恶臭，有些地方甚至让我想起隔离区里肮脏的环境。孤独就像饥饿一样吞噬着我”（151）。米卡无法融入主流生活，他所闻到的气味凸显了米卡被孤立的感觉。米卡到了美国之后还时常梦见“咚咚作响的军靴、尖叫的木偶、炽热的火焰”（151）等关于战争的记忆。战争的气味揭示出战争带给米卡难以抹去的创伤：“我能像圣伯纳德犬嗅出雪崩后的幸存者那样嗅出其他的战争幸存者。我没什么可以展露的。我的悲伤都刻在心里”（151）。气味使米卡将过去不堪回首的战争记忆和现在联结在一起，米卡不禁感慨“一个人很难与过去、和记忆、和自己学会走路的地方分裂。记忆，就像流在血管里的鲜血，存在我们内心深处，如象形文字一样在我们的灵魂刻下烙印”（151）。此时，虽然已是战后，气味在米卡脑海中形成的脑文本却依然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让他时不时回想起过去可怕的战争经历。

米卡在战后的异化感在德国士兵麦克斯身上重现，而气味深化了麦克斯作为施暴者的创伤。麦克斯在战败后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战犯营，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回到德国的家。然而，回家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自己的家庭和社会，深感自己是一个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人，没人愿意倾听他作战的故事，连妻子和儿子对他表现得比较冷淡，都无法理解他。由于无法融入昔日的社交圈，麦克斯只能独自做着木匠的工作，而工作的时候“木头发出的刺鼻而强烈的气味都让他头痛不已”（198）。木头的气味也使他回想起自己在西伯利亚作战犯时被迫做的繁重的伐木工作。亲朋的冷漠和每天不

1 本文有关《华沙的木偶男孩》的引文均来自 Eva Weaver,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London: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2014)。引文均出自笔者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得不重复的枯燥的劳作让麦克斯感到自己虽然回到了家，但是却像在西伯利亚一样心寒、孤单和难过。麦克斯被疏离和被孤立的感觉愈发强烈：“反正没人能理解我。我回不到正常人的世界里了，无论在哪，我都是个异类”

（203）。麦克斯还时常想起战争中的血腥味，华沙城里的大屠杀记忆在麦克斯的脑中形成挥之不去的脑文本，不断折磨着麦克斯：“还有华沙的鹅卵石街道，它们还记得我们行进的脚步和鲜血吗？麦克斯知道自己永远不能挣脱过去的束缚”（202）。气味成为麦克斯难以诉说的创伤的载体，在不正义的战争之下，战争双方都是战争机制的受害者。

除了臭气之外，小说中还有人物的体香、以面包、果酱和肉汤为主的食物香气和以大衣和肥皂为代表的日常物品的香气，这些香气构成了米卡和麦克斯独有的个人的战争记忆。香气往往与治愈疾病、拯救生命、净化灵魂等寓意相联系。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香气抚慰人心，给战争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欣慰，并且反衬了战争的苦涩。在个人的主观感知下，苦难的战争记忆变得弥足珍贵。对米卡来说，艾莉身上散发的香气是困苦战争岁月中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之一。初见艾莉，米卡就感受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薰衣草香味。在与艾莉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艾莉成了米卡最信任和最亲密的人，身上散发着米卡最熟悉和最迷恋的香气。米卡被迫为德军表演了木偶戏却不敢告诉其他人，他倍感孤单和煎熬，只有艾莉能减轻他内心的苦闷。艾莉身上散发的荷尔蒙的气味支撑着米卡度过与德军对抗的艰苦日子。在闷热的地堡中，环境恶劣，“但荷尔蒙的气息依然强烈”（144）。瓦润的研究表明，“由于荷尔蒙平衡的改变，气味的感知和传递会对性冲动和性行为产生影响”（133）。米卡和艾莉身上散发的气味互相吸引对方，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让他们在离别的最后一个夜晚里发生了关系：“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生命随时都可能结束，更加凸显了我们对彼此的需要，这件最自然的事情提醒我们，还有生命、光明和超越隔离墙的东西”（145）。两人感受到的性爱的气味是残酷的战争中少有的快乐，也是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战争记忆。此时此刻，荷尔蒙的气味成了爱情的象征，也形成了他们对幸福感知的脑文本，让米卡在战后多年依然在脑海里不停地回忆与艾莉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嗅觉与人类的主观感知密不可分，香气使得战争期间一些原本充满苦难的时刻变得充满爱与温暖。年少的米卡在被赶到隔离区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想起了早年过世的父亲身上的气味：“关于父亲的记忆逐渐褪去了，只留下气味和声音的痕迹：一种浓烈的肥皂气味、汗水味、烟草香味和酒精的味道混合着深沉、温柔的和让我安然入睡的声音”（23）。在危难中，父亲的气味给米卡带来了安全感和力量。后来，米卡逐渐成长为有担当的男子汉，用智慧和勇气帮助解救了许多隔离区里的犹太孩子。米卡第一次用从爷爷那里继承的大衣偷运孤儿院的女孩爱斯特时，也闻到她的身

上散发出浓烈的肥皂气味。正是这种普通又清新的肥皂的气味迷惑了德国士兵，让她没有被发现。米卡将女孩成功运送到目的地之后，“只剩下女孩身上的香气依然留在大衣上，经久不散”（7）。香气抚慰了米卡紧张而恐惧的内心，为惊心动魄的偷运之旅增添了喜悦之感。孤儿院里的气味也是属于米卡的特殊记忆，虽然每次米卡去孤儿院看望孩子都备感心酸，但是总能获得新的力量。孤儿院里的孩子过早地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承受了战争的苦难，但是在对孩子充满爱心的米卡看来，孤儿院“很干净，井然有序，满是清新的气味”（50）。这是肮脏的战争中一片难得的净土，闪耀着人性善良的光辉。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食物的香气成为个人主观感受下的珍贵记忆。米卡在木偶剧演出后，与孤儿院的女孩汉娜分享的罐头中散发的令人难忘的甜蜜气味给他们苦难的日子带来短暂的幸福：“久违的香气飘过，甜蜜而充实，果酱罐里是整个快乐的夏天”（48）。在米卡眼里，即使条件艰苦，但是罐头的甜蜜气味依然让他暂时形成了快乐的脑文本，让他在苦难的战争期间感受到一丝甜蜜。德国士兵麦克斯在逃出西伯利亚的回家途中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慷慨帮助，村民给他喝的肉汤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肉汤的香味与他在西伯利亚作战犯时喝的稀薄的汤水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备受屈辱的麦克斯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气味成为麦克斯格外珍贵和难以忘却的个人记忆。

总体来看，小说中，气味、记忆与情感紧密联结。在苦难的战争年代，人们对气味的感知强烈而持久。弥漫的臭气加剧了米卡和麦克斯对战争的厌恶，加深了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飘散的香气又为苦难的战争岁月增添了些许慰藉，成为独特的个人记忆。因此，战争中不同的气味在人的脑海中形成脑文本，丰富了个人对战争的主观感受，深化了个人的战争记忆。

二、气味与战争的集体记忆：整合与建构

小说描绘了大屠杀历史中的众生相，这些普通人物共同构成了战争的广阔景象。小说揭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和残害，是对血淋淋的犹太民族受迫害史的再现。为了实现拓展新“生存空间”的法西斯侵略政策并教化所谓的“落后、野蛮和低等”的波兰人，德国纳粹将波兰沦为其种族迫害和灭绝政策首次全面实施的实验场。从1939年9月起，“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警察部队、德意志民兵组织和普通德国士兵大肆掠夺抢劫、羞辱侵犯和虐待屠杀波兰德占区的无辜群众”（埃文斯 36）。在大肆宣传的反犹主义和针对犹太人制定的“最终解决”方案的驱动下，纳粹对波兰的犹太人进行了更加非人的残害。小说开篇发生在2009年的纽约，米卡向外孙丹尼尔讲述了家族的大屠杀故事。大屠杀的历史图景随之在读者面前展开。米卡详细叙述了1938年二战前夕犹太社区短暂的和平生活以及从1939年二战爆发到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期间犹太人的受难史。纳粹对华沙犹太居民的疯狂和恐怖的炸弹空袭、

强制驱赶和隔离、暴力抢夺和侵占私有财产、肆意侵害和虐杀个体生命等残暴行径也得以全面呈现。因此，小说既有对战争中的犹太人和德国士兵个体的微观关照，形成战争的个人记忆，又有对民族和全人类命运的宏观思考，构成战争给犹太人和德国纳粹士兵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 1992）中系统地阐释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存在着一个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个人的思想置于这些框架内”（38）。哈布瓦赫认为个人记忆只有在家庭、组织、国家等群体语境下才能被理解，在社会结构和机构内才能被建构：“个体在记忆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都依赖于社会”（54）。由此可见，只有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进行记忆，集体记忆是由个体进行记忆建构的。因此，小说在战争的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建构民族的大屠杀集体记忆。战场是各种复杂气味的集合地，气味是记忆建构的媒介之一。

小说中交织的臭气和香气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将个人的战争记忆建构为集体记忆。首先，个体将群体中的个人记忆进行整合，形成战争的集体记忆。对犹太人来说，恐怖和血腥的恶臭气味构成了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在被德军驱赶到犹太人隔离区时，米卡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自己感到害怕至极。同时，由于气味能引发主观情感，嗅觉上受到的刺激使得米卡产生共情，通过自身对气味的感知获得犹太人群体对战争的感受。米卡将周围人的恐惧形容成一种气味：“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痛苦和绝望，恐怖的气息四处洋溢，像浓雾一样弥漫在每家每户，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浓郁而闷热地悬挂在我们头顶”（20）。犹太隔离区拥挤不堪，疾病和死亡的气味肆虐，四处都是痛苦和绝望的气氛：“卷心菜、泥土、下水道和死人的混合气息，以及被关在一起无处可逃的囚徒的气味”（45）。“恶臭、拥挤和令人压抑的灰暗似乎要把我们全部吞噬”（28）。最后，德军准备彻底摧毁隔离区，四处都是爆炸后留下的令人恶心的气味、犹太人躲在地堡跟纳粹德军作战时因拥挤而散发的汗臭味和致死的毒气味：“浓烟和毒气却像杀虫子一样把我们全部杀死一些人受到新鲜空气的诱惑从地堡里爬出来，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142）。米卡基于自身对战争的认知，通过感知战场上犹太人共享的各种气味，形成犹太民族对于战争的记忆，因此他的个人记忆也代表了所有犹太人的集体记忆。

其次，一些与香气相连的个人战争记忆通过家庭物品的代际传承和战争故事的讲述，被建构为整个家庭和民族应对战争危难的集体记忆。“代际间的记忆形成一种记忆共同体，而集体记忆则被视为这种共同体的组成部分”（Blustein 224）。每一代人的记忆都与上一代的记忆紧密相连：“我们与上一代的记忆联系紧密，这种记忆到掌握这个事件的第一手记忆的那代人为止”（Margalit 59）。大衣的气味通过大衣的代际传承和气味背后的战争故

事的讲述将米卡的个人记忆转变为米卡家庭和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小说中，一个纳粹士兵命令一位犹太女性脱光衣服，米卡的爷爷正好在场，勇敢善良的他正准备用大衣包裹保护她，却被德军残忍地杀害。爷爷用最后一口气交待米卡“好好留着这件大衣”（24）。从此以后，大衣便与米卡形影不离。大衣上依然留有爷爷身上的体味，是米卡和爷爷亲密的感情联结点。米卡呼吸着大衣上残留的香气，想让香气淹没自己。米卡紧紧地拥抱自己，奋力地找寻爷爷的气味，试图抓住爷爷留下的一切：“我把大衣铺在床上，躺在上面，寻觅着爷爷的气息，寻找着爷爷生命的痕迹”（25）。爷爷去世后的好几天，陪伴米卡的只有爷爷的大衣和它的气息：“我生活在这件精心制作的作品里，闻着它的香气，使其将我包裹”（27）。大衣成了米卡的心灵慰藉，是他安静的陪伴者，大衣上总有“令人安心的”味道（63），帮助他躲避战争的纷乱。那么，大衣的气味是如何超越米卡的个人战争记忆，成为米卡家族和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人记忆可以转为集体记忆，但是在集体记忆中，“个人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共同回忆群体成员的事迹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24）。代际的集体记忆通常“不以一个具体的事件而终，而是以对于事件的故事讲述而终”（Margalit 60）。当米卡将装有大衣的盒子在外孙丹尼尔面前打开时，衣服的气味依然非常浓烈刺鼻，令人难忘。米卡穿上大衣，向外孙讲述了犹太民族的战争故事，揭开了深藏于大衣之中的战争秘史。通过讲述战争故事，米卡把过去的记忆召唤回来，为大衣重新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因此，米卡觉得“他的旧外衣仍然充溢着生命”（13）。大衣的气味在米卡和外孙的脑海中形成了脑文本，成为连接过去的战争岁月和现代生活的纽带。大衣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临近结尾的时候。在米卡去世之后，米卡的女儿汉娜将大衣挂起来，它不再需要被藏进盒子中，而是作为承载记忆的家族传承物被展现出来。大衣安静地挂在那里，无声诉说着几代人的故事，关于大衣的战争记忆都藏在一针一线中。这件凝聚着爷爷、米卡及米卡偷运的犹太孩子的气味的大衣历经战争的捶打，从米卡的爷爷传到米卡的外孙手上，带着米卡家族的苦难和厚重的犹太人的历史，成为了犹太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大衣的气味不仅伴随米卡个人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也帮助后代们了解家族和犹太民族在战争中用智慧和勇气对抗纳粹暴政的故事。在代际间被传承的大衣上留下的气味与米卡家族的战争记忆相联系，个人记忆也由此转变为家庭的集体记忆。通过米卡讲述犹太人的大屠杀受难史，大衣身上承载的家庭集体记忆又被建构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

此外，某些属于个人记忆的香气将犹太人和德国士兵联结起来，将战争双方共同置于战争的机制下，最终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米卡被抓去给德军表演木偶戏的路上，他看到德军生活区完全是另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与破旧的犹太人隔离区有天壤之别。德军生活区“到处都是斑斓的色彩，散发

着丰盛的新鲜蔬菜和花朵的香气，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59），而隔离区的人却“在死亡的边缘挣扎”（59）。米卡曾经熟悉的犹太面包店老板也生死未卜，无法让犹太民众“免受面包稀缺之苦”（60）。德军生活区散发出来的刚出炉的面包的香气反衬犹太人物资匮乏的痛苦。战后，德国士兵麦克斯被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面包再次出现，吃饭时每个战犯只能吃上“一小片黑麦面包的可怜早餐”（165）。麦克斯深切地体验到了犹太人曾经经历的食不果腹的辛酸。从西伯利亚回家后，他看到妻子浪费面包，十分痛心，向妻子诉说了战犯营中的艰苦生活：“没有面包，人就没法活了。我们现在食物多到不知道要吃哪一种。而我的同志们仍然在集中营里偷生，除了稀薄的汤水和一小块发霉的面包之外，什么都没有”（197）。到了21世纪，面包的香气持续飘散，在现代生活中重新出现：麦克斯的孙女玛拉和米卡的外孙丹尼尔在纽约见面时，他们在一家面包店停了下来。“一阵新鲜出炉的面包香气扑来，如迎接他们的温暖的拥抱”（243）。二战期间，面包象征着米卡曾经温暖的家的味道，是米卡通过出卖灵魂为德军表演木偶戏换来的给全家的食物供给，是许多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带的食物。战后，面包对德军战犯来说是稀罕的食物。如今，在战争年代无比稀缺而珍贵的面包已成为平常的食品，面包散发的香气凝结了过去战争岁月的苦难。面包的气味象征战争带给犹太人和德国人共同的苦难，将过去的战争记忆和现代生活相连，成为犹太人和德国人的集体记忆。

总体而言，小说中，米卡通过对气味的感知，将犹太群体成员中的个人战争记忆进行杂糅和整合，形成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脑文本。还有以大衣和面包为代表的气味从战时持续到战后，被建构为集体记忆。通过传承带有浓烈战争气味的大衣和讲述气味背后的故事，大衣超越了米卡的个人记忆，成为了米卡家庭和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将米卡家族的每代成员紧密相连，增强了家族和民族的集体认同感。面包的香气凸显了战时犹太人隔离区苦难的生活和德军富足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也突出了德军作为战时施暴者的充裕资源和作为战后受罚者的物资匮乏之间的鲜明对比。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命运发生了转化，气味将战争双方同等地置于战争框架之下，将个人的战争记忆构建为德军和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在此情况下，战争便不再局限于影响个人的感受，而是给所有经历战争的人带来持久的伤害。因此，超越了个人感知的战争记忆引发战争中的个体对战争进行伦理反思，也促使和平年代的人们对战争进行思考。

三、气味与战争的伦理隐喻：反思与教诲

集体记忆的象征、身份建构、整合个体和激励集体行为的功能使得集体记忆具有伦理责任。“共同的记忆在联结群体、塑造和表现其身份认同感方面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可以合理地认为集体记忆有伦理义务”（Blustein

223)。因此，在将个人记忆建构为集体记忆之后，小说中的气味也反映了它所承载的伦理隐喻。小说中臭味和香气的交织揭示了人物遭遇的伦理困境。臭气往往与恐怖、痛苦和死亡相连，香气则隐喻着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米卡为代表的犹太人渴望和平，却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遭受的身心创伤如幽灵般伴随他们一生；以麦克斯为代表的有良知的普通德军同样渴望挣脱战争的机制和纳粹的暴政，却被迫变成杀人工具，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始终备受良心的折磨。臭气和香气的交替出现不断提醒他们求而不得的痛苦以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致使他们陷入难以挣脱的伦理困境。小说中，无论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米卡还是作为施暴者的德军麦克斯及其后代玛拉在陷入伦理困境时，都受到嗅觉上的刺激，在头脑中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不断形成关于战争的正义性、罪恶、赎罪等脑概念，这些概念最终转化为脑文本，并促使受害者和施暴者最终做出伦理选择和伦理反思。“脑文本具有伦理价值。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文学教诲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文学的脑文本转换实现的”（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因此，小说中的气味还有重要的伦理教诲作用，促发读者对战争进行思考。

具体而言，米卡和麦克斯身上气味的相通揭露出他们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气味在米卡的双重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加凸显米卡陷入的伦理困境。米卡被迫为德军表演木偶戏，德军大本营里混杂着德军的汗水、啤酒和香烟味，令米卡极其厌恶。在军营里，米卡不禁感慨“里面的噪声和恶臭几乎要将我赶出来。汗臭和烟草的浓雾在空中飘荡”（62）。然而，想极力摆脱这种味道的米卡却不幸沾染到了这些气味：“只记得我被迫喝了很多啤酒，衬衫湿透了，浑身散发着酒臭”（67）。因此，每次表演结束后，米卡都会试着去军营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也是为了能驱散遗留在身上的顽固气味。然而，米卡身上浓烈刺鼻的味道却不易消散。每次回到家，妈妈总能闻到米卡身上的气味：“你身上的味道很难闻，有啤酒和香烟的味道”（69）。母亲也能察觉米卡“换回这些面包的代价不仅仅是被迫表演木偶戏”（69）。米卡付出的代价还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并被迫在伦理困境中苦苦地挣扎。沾染上德军士兵身上的臭气让米卡感到恶心：“麦克斯嘴里喷出的啤酒和香烟的混合气息让我反胃”（68）。米卡感到自己和德军同流合污，为自己在取悦那些击毙爷爷的德军而深感羞耻：“我是不是在背叛我的人民？我讨厌自己，也厌恶那群像我一样被玷污、被迫妥协的木偶”（67）。在这种伦理困境下，米卡迷失了自我，变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我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和勇气，所剩的只有一个外壳，肮脏不堪”（68）。深陷伦理困境的米卡愈发厌恶自己的双重面孔：“除了埃莉，没有人知道我的双重生活：米卡，既为孩子们演戏，同时也会为吃掉他们的恶魔服务。我无法入睡，每天早晨，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觉得十分恶心”（76）。即便如此，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生存下去，米卡每天不得不继续

违背自己的良心过着这种双重的生活。因此，与德军相连的啤酒味和香烟味隐喻米卡面临的伦理困境。

麦克斯身上的气味同样暗示他遭遇的伦理困境。当米卡的母亲和阿姨被纳粹德军准备送往集中营的时候，麦克斯冒着背叛组织的危险帮助米卡解救并重新安置她们。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麦克斯将地址交给米卡时，米卡闻到麦克斯身上散发着“香烟、汗水、啤酒还有一些我无法分辨的气味。是恐惧？痛苦？仇恨？”（114）米卡闻到的气味正好是他被迫表演木偶戏时德国军营里的味道，复杂的气味是米卡曾经极其厌恶和拼命想要摆脱的气味。如今，这种气味在麦克斯身上重现，暗示着麦克斯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是一个冷血的德国士兵，受到希特勒的欺骗被迫卷入战争洪流；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作为普通人的正常情感和良知。麦克斯在忠于军队和同情米卡的两难之下，选择了遵照自己的良心来帮助米卡。气味的背后是让外人琢磨不透的复杂情感，也揭示出麦克斯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两难抉择的痛苦。麦克斯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做出的伦理选择也反映了在战争的残酷机制之下，德军士兵里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些尚有人性的士兵和一味服从命令滥杀无辜的士兵”（118）。米卡对麦克斯的善举心存怀疑，但又对其深陷的伦理困境表示共情：“他是德意志国防兵的一员，是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并且发誓要服从命令。也许他和我一样，深陷困境？”（110）

小说中的气味不仅揭示了人物遭遇的伦理困境，还具有伦理教诲的作用，唤起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对大屠杀进行伦理反思。不少战时附在犹太人身上的气味在战后的德军身上重现，引发德国士兵对其残忍行径的反省。气味在战后的现代社会的再现也促使现代人对战争进行伦理反思。麦克斯和其他战犯刚刚被押往西伯利亚的时候，麦克斯的脑海中就不断重现关于战争的惨烈场景和德军对犹太人犯下的残酷罪行。当麦克斯看到尸横遍野，到处都是腐臭的稻草气味和随时腐烂或冻死的尸体的味道，他不断反省“大屠杀是毫无意义的”（158），不得不感慨“以前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现在残忍地传到了他们的身上”（158）。战后被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力的德军战犯感到自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浑身仿佛散发着“猪的味道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把我们变成猪，让我们忘记自己是人”（165）。“我们像苍蝇一样死掉”（201）。二战期间，纳粹剥夺了犹太人生活的物资和生命的权力，将犹太人都变成“行将饿死的，对他人命运视若无睹的行尸走肉”（29）。浓烟和毒气还将人变成随时会被消灭的虫子。战时犹太人身上散发出的动物般的腐臭味被转移到了战后德军战犯的身上，此时战后的德军战犯营地里伤寒、痲病和天花蔓延，散发着“呕吐物和化脓的伤口的臭味”（171）。这与战时犹太隔离区医院“弥漫着无法掩盖的疾病、死亡、溃烂的伤口和粪便的臭味”（79）一样。战后，德国士兵闻到的恶臭让他们深切地感到了战争带给犹太人的恐怖和死亡的气息，让以麦克斯为代表的德军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

罪恶，反思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部分德国士兵认为自己罪有应得，麦克斯也坚持认为德军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同时也深感自己作为战争机器的愧疚：“在斯大林格勒、华沙、克拉科夫等大屠杀之后，我们活该这样”（168）。“在华沙经历的一切让我余生都会在噩梦中度过。自己就是这一切战争机制的一部分”（169）。因此，曾经萦绕在犹太人身上的恶臭味在战后被传递到德军战犯身上，气味的传递表现出战争双方遭受的创伤，促使普通德国士兵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恶进行伦理反思。

战后多年，战争的气味在麦克斯的孙女玛拉身上再现，也促使她对战争进行反思。玛拉执意要求父亲告诉她关于战争的一切。当她听到大屠杀这个字眼的时候，“尝出嘴里的痛苦和腐臭的味道”，感慨“人类居然能对彼此做出这样的事情”（214）。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玛拉能通过气味感受到大屠杀给人类带来的灭顶之灾，气味成为现代人了解战争的重要媒介。在听完父亲的大屠杀故事并看完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后，玛拉在脑中形成了关于大屠杀惨烈场景的脑文本。玛拉将自己置身于受苦受难的犹太人中，与犹太人建立联结，对犹太人的深切同情使得她仿佛也能感受到集中营的战争气味。听觉、视觉和嗅觉各种感官联动，共同构成了玛拉关于愧疚和赎罪的脑文本，并“点燃了她内心的一种渴望，一种强烈的要探究人性深渊的欲望”

（214）。一种后代偿还先辈犯下的罪过的代际伦理得以建立。玛拉开始反思战争和德国人的罪过，坚持认为德国人“与修建这些集中营的德军有着一样的血脉”（215），应当铭记历史，为德军犯下的罪行深感自责。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军犯下的罪行和战争的残酷，玛拉毅然决然地去寻找战争留下的痕迹。21世纪，当玛拉再一次来到华沙时，她依然能感觉到在这座饱经战争摧残的城市里伤痕累累的“气味”。当她来到帕菲克集中营的腹地时，“潮湿而腐臭的空气向她袭来”（224）。她在监狱院子里不停地嗅着，寻找米卡曾经留下的气息。参观集中营让“玛拉感到一阵恶心，难以呼吸。从暗室出来之后，大口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225）。曾经，米卡表演完木偶戏后也急于从乌烟瘴气的德军大本营逃到外面呼吸新鲜的空气。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气味将战时的犹太人和战后的德国士兵后代联系在一起。玛拉在参观“华沙隔离区起义英雄纪念碑”和“帕菲克集中营”时依然能闻到战后集中营遗留下来的恶臭，感受到战争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玛拉对德军犯下的罪行愧疚不已，不禁泪流满面。城市忠实地记录了战争给人类文明史留下的深重灾难，城市的战争记忆也是人们反思自身和重建文明的基础。气味重现历史、再现记忆、联结犹太人和德军的后代，唤起现代人对大屠杀的反思。

总而言之，米卡和麦克斯感受到的共同的气味都突出了犹太人和德军面临的伦理困境。战争的恶臭味通过在战后的传递和再现引发德国士兵及其后代反省德军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反思战争的正义性，也教诲现代人对如何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和构建和平的世界进行深入的思考。

结语

本文以气味作为切入点，基于气味与记忆的紧密关系，结合集体记忆的理论 and 脑文本的概念，探究伊娃·韦弗的大屠杀小说《华沙的木偶男孩》中的战争记忆的建构与伦理反思。小说从战争中的普通小人物出发，揭开大屠杀的血泪史。小说不仅揭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径，而且展露了普通德国士兵的身心创伤。丰富多样的气味是构成战争场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对战争的叙述更为具体和真实，深化受害者和施暴者双方对战争的感知和思考，更加彰显小说的反战价值。小说中的人物感知不同类型的气味，形成对战争记忆的脑文本。战争中血腥的恶臭和伤亡的腐臭气味以及人物的体香和食物的香气都丰富了犹太人米卡和德国士兵麦克斯对战争的主观感受，深化了个人的战争记忆。当战争的个人记忆通过气味媒介以各种方式被建构为家庭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后，气味便具有伦理隐喻并对现代人产生伦理教诲作用。气味的传递和再现揭示出米卡和麦克斯共同面临的伦理困境，促使麦克斯及其后代和现代读者对战争的正义性进行伦理反思。

大屠杀绝不能仅仅被简化为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灾难。透过气味这个“小孔”可以审视宏大的大屠杀机制，体味战争中施暴者和受难者的起伏命运，洞察人性的千姿百态，反思人类文明何以堕落至此，思考人类为避免重蹈覆辙应何去何从。对战争记忆和伦理反思的研究不仅能够让人类直面过去的苦难，而且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揭开并正视记忆的真相，而不是试图掩盖或抹去记忆的伤疤，才是治愈创伤的第一步。只有铭记历史、反思过去并且承担责任，才能实现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与发展。

Works Cited

- Blustein, Jeffrey. *The Moral Demands of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8.
- Classen, Constance et al.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Engen, Trygg. *The Perception of Odo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82.
-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1992.
-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4.
- Weaver, Eva. *The Puppet Boy of Warsaw*. London: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2014.
- 理查德·埃文斯：《战时的第三帝国》，陈壮、赵丁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
-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at War*, translated by Chen Zhuang and Zhao Ding.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20.]
- 阿尼克·勒盖莱：《气味》，黄忠荣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
- [Le Guérér, Annick. *The Odor*, translated by Huang Zhongrong.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5 (2017): 26-34。

[Nie Zhenzhao.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 徐和瑾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年。

[Proust, Marcel. *In Search of Lost Time*, translated by Xu Heji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齐奥尔格·西米尔: 《时尚的哲学》, 费勇、吴贇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translated by Feiyong and Wu Yan.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

派特·瓦润等: 《嗅觉符码: 记忆与欲望的语言》, 洪慧娟译。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Vroon, Piet et al. *Olfactory Code: The Language of Memory and Desire*, translated by Hong Huijuan. Shantou: Shantou UP, 2003.]